

五大视角看中华文明特质

□ 孔新峰

那么，中华文明具有哪些特质和精华呢？我们不妨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建设领域出发，略述中华文明的特质。

从物质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向来将人本身置于中心地位，“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离不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中华文明也具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精神，持经达变、与时偕进的“时中”气质，以及尊重差异、包容异己的“中和”法则，这些精神传统在当下具有特别的优势，可以避免僵化思维，进而发挥多元共通的交融优势，确保经济转型新进平稳而非激进动荡，确保经济发展多元共融。中国自古就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具有浓厚的政治意涵与公共属性，儒家伦理与殖产兴业并行不悖，“义利之辨”为经济生活注入浓厚的伦理品质；在道家的政治理想和后世的政治实践中，治理者“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但不与民争利，而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儒家和道家的经济理念有殊途同归之妙，在历史上一脉相承，使治理者积极介入生产分配各环节，有力统筹整合各地域和各阶层经济生活，在节流和开源之间、安全和财富之间、局部和全局之间、眼前和长远之间努力维持平衡。

从政治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拥有“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国家治理思想资源。中国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根本的国家治理制度惯性，并高度重视“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积累了大量历史行之有效、足以维系一个广土众民大国的治理经验，有效处理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课题。

从精神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拥有立德树人的、人文化育、改易更化等人文主义柔性治理的精神特质。即便是深受西方列强压制的晚清士人，依然对实现富强与追求王道有清醒认识，认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在力求富强的过程中，依然对王道有坚守有追求。在孔子时代，果敢质朴的北方

之强和宽柔忠恕的南方之强各有其强，二者本来是一种价值判断，也许孔子更推崇南方之强，也许他认为的理想状态是把二者结合起来；而在现实中，只有在汉唐盛世的少数时期，儒家的理想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北方之强和南方之强共同构成了天下之至强。历史上，兼具二者之强的时代实为罕见。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是超越地理方位、超越东西分歧、包容万方的文化强国。

从社会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向来具有家国共同体、礼乐共同体等共同体本位的鲜明特质；而对于共同体中的个人，则追求“明明德于天下”，期待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彰显其美德，彰显其在共同体中的主体性。这些思想传统，足以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厚重的本土资源。

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儒释道三家都致力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古人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为实现这一诉求，历历代代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在探索实践，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这些自古以来的理念诉求和实践探索，对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中华文明孕育出中国道路，滋养了中国精神，不仅存诸青史，更泽润当下。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已然初步呈现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貌。当代真实的中国，是仁爱民本、立己达人、互惠共赢、稽古开新的中国。

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更好阐扬中国文明、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一个和平的、文明的、可亲的中国。



商周易代的特殊性

□ 顾 春

我们一直说，中国历史道路是与众不同的，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具有独特性，其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但以下五个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它们分别是商周易代的特殊性、中华文明的早熟和高度发达、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

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周武王联合各路诸侯灭商并建立周朝，史称西周。在西周以前，当时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黄河中下游流域，也就是在今河南省商丘和安阳一带，而周人则一直生活在今陕西西安以北以西的泾渭地区，因此，在商王朝的政治格局中，周不仅是小邦，而且地处偏远。到了商末，周人的势力已强大起来，但其灭商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周能灭商而代之，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商纣王的残暴无道使其众叛亲离，二是周联合八百诸侯共同伐商。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周人灭商后的执政思想和统治格局。

首先，周朝的执政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神教向德治转变。在商代，人们普遍相信天命的力量，神是统治一切的，胡适就曾说“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比如，当西伯侯即后来的周文王攻克距商朝都城朝歌距离很近的黎国、情况已万分危急时，商纣王竟然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但是，自居天命在身、拥有巨大都城的东方大国商，却最终被小邦周所灭。这一重大事变促使时人重新审视天命，对于周人来说，取商人而代之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对自己也是一种警示，他们由此重新审视天命观，认为天命可信不可恃，人

的作为可以影响天命移易，百姓的意思可以上达于天，只有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才能永保天命。这些重要思想表明，西周社会逐步由神本向人本、由神权政治向伦理政治、由祭祀文化向礼乐文化转变。从此，中国告别了神教社会，开启了后来的以德治国之路。

其次，周初对商人后裔作了合理的政治安排，商人的宗族组织得以存续。商王军队的临阵倒戈，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商朝的军事力量并未受到根本性打击，二是军队反对纣王。但是，反对纣王不等于拥护周王，因此，周王必须用妥协的办法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统治。具体表现为，在宗庙活动中，周人在祭祖时，虽然周人的祖先居首，但同时商人祖先也尊享祭祀地位。在政治格局中，周人笼络商人贵族，保留商人的宗族组织，原来的宗族长依然领导各自的宗族。为防止商人造反，周人让几个大的宗族成建制地搬迁到异地，并派亲信予以监视。之后，这种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宗族长期延续至后世。

再次，周初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不仅使周文明与商文明有了重大分野，也使中国的文明进程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事件就是周公制礼作乐。制礼作乐的有关记载可见于《尚书大传》《左传·文公十八年》《礼记·明堂位》《史记·周本纪》。这套礼乐制度被后来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作了系统的追记。可以想见，在礼乐初成之时，不可能形成如此周详的制度，但是，这些典籍所反映的基本精神是符合周礼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隐

公十一年》又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就是说，礼是处理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总规定，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总法则。周礼的基本精神包含两个方面：国家和社稷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所以要“尊尊”，也就是尊重应该尊重的人，这里指的是贵族；人民及其后代都天然地分属各自的宗族，所以要“亲亲”，也就是要亲爱应该亲爱的人，这里的人是指血缘亲族之人。而从《礼记·曲礼》等典籍对周礼的描述来看，礼不仅是全社会行为准则的总纲，而且还指各种社会关系的具体规范，包括了制度、礼仪和伦理道德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殷周之际的这场剧变及其结果，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西周统治者的天命可信不可恃的思想，既强调了人的有为，又认同天的制约，不仅使中国很早就开始了从神到人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而且使中国人形成了尽人事而听天命、勤劳顽强等民族性格。西周统治者的敬德保民、崇拜祖先、亲亲尊尊等思想和以此建立的礼乐制度都为后世所继承，并发展为礼教，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而宗族组织较完整的保存延续，则为礼教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总之，商周易代和制礼作乐对后世的影响是全面、广泛和深刻的。



陈嘉庚（1874—1961年），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各个阶段，陈嘉庚都作出过重大贡献，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实业报国

实业报国是贯穿陈嘉庚一生的一条主线。诚如他自己所说：“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经困难，未尝一日忘怀。”

鸦片战争后，在困顿与徘徊中挣扎的中国人奋力求索，掀起了“下南洋”谋生的热潮，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就是其中一员。陈嘉庚出生时，父亲正在新加坡经营米店和一家小厂。1891年，17岁的陈嘉庚第一次下南洋从父经商。不幸的是，1904年父亲破产并欠下巨额债务，重振家业的担子落在了青年陈嘉庚的肩上。事实上，根据当时新加坡的法律，父债不必子偿，但从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陈嘉庚还是毅然承担了父亲的所有债务，从此便也开启了艰辛的商业之旅。他曾这样回忆道：“非常事业要达成功，亦应受非常之辛苦，若乏相当之毅力，稍不如意，便生厌心，安能成事哉？”可见创业的道路是极为困苦的。

而立之年的陈嘉庚，经过多番市场考察，发现菠萝罐头销路多且投入资金少，于是决定利用手头仅有的资金加借来的7000元，在距离新加坡城区10英里的淡水港山地创办菠萝罐头厂，并给自己菠萝罐头的商标定名为“苏丹”，意思是菠萝罐头的之王。在陈嘉庚的精心打理下，菠萝罐头厂的运营非常好，收获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1906年夏季，菠萝罐头行市低迷，陈嘉庚的罐头厂遭遇打击，这使得他不得不探寻新的商业项目。一次偶然机会，陈嘉庚从一个橡胶商人那里购进18万粒橡胶种子并购买了大片土地，建起了自己的橡胶种植园，后成为雄踞南洋的橡胶王国。而其经营的菠萝罐头厂走出低迷之后，在1913年产量已经占据整个新加坡的半数以上，真正成为了业内的“苏

丹”。不仅如此，此时的陈嘉庚审时度势，决定涉足轮船航运业，及时改变经营策略的他再次赢得了可观利润。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依靠经营的菠萝罐头厂、米业、橡胶业和航运业，迅速跻身新加坡富豪之列。从一贫如洗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实力雄厚的企业家，陈嘉庚是华侨史上第一个“赤手空拳走出去”的东南亚工商巨子，树立了华侨华人在海外艰苦创业、诚实守信的成功典范。

教育兴国

在获得巨额财富时，陈嘉庚始终没有忘记奉献于祖国，认为振兴工商业的目的在于报效祖国。

早在民国初年，陈嘉庚就敏锐地认识到“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正是本着这份爱国兴学的初心，他多次返回故里，倾资办学。他先后在故乡创办了集美小学、幼稚师范、乡村师范、女子师范以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专门学校。

陈嘉庚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他一手创建福建省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厦门大学。作为全国唯一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当时厦门大学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大学院，17个系。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正式开学，却因严峻的全球经济危机，遭遇办学资金急剧减少的困境。尽管市场的不景气严重打击了华侨企业，但陈嘉庚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表示：“宁可变卖大厦，



也要支持厦大。”嘉庚先生果真变卖了自己的3座大厦，换取维持厦大运营的经费。

据不完全统计，陈嘉庚一生用于办学的善款超过1亿美金。他不仅自身倾资兴学，而且带动一大批仁人志士捐资助学，振兴中华。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大批华侨纷纷捐资办学，蔚然成风，使中国的东南部崛起数座学术重镇。

抗日救国

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苦难中的祖国。1906年，陈嘉庚与途经新加坡的孙中山初次会面，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热情投身于民主革命，于1910年春加入中国同盟会。

九一八事变前后，陈嘉庚积极从

事抗日救国活动。1928年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陈嘉庚听说后，立即领导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精心筹划组织，带头捐款捐物、认购国债，使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还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品。

在全力支援祖国抗战的过程中，陈嘉庚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理解与认同。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技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回国，这是他一生中尤为壮丽的篇章。他

在《南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这次考察重庆、延安等地，访问国共两党，可以说陈嘉庚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辛苦”。此行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望和延安的政治清明，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他据实发表关于延安观感的演讲，积极热情宣传，盛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的爱国民主活动依然在继续着，他积极创办《南侨日报》，宣传爱国民主思想。

建设祖国

陈嘉庚自幼饱读诗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先贤的“大一统”思想无疑对他有重大影响。在参与实业救国、教育兴国、抗日救国的过程中，陈嘉庚深刻认识到，中国只有完成统一，才能够抵御外侮、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梦想。而在与中国共产党多年的相知相交与精诚合作中，他更是对党的理想、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了深刻的认知与发自内心的认同。作为一名曾去

国怀乡、旅居海外的华侨，他对祖国统一的期盼之情更是根植于心。

1949年新中国诞生，陈嘉庚应毛泽东的盛情邀请，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祖国。新中国的成立，让他为之奋斗的民族复兴大业迎来了曙光；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他倾注毕生心血的教育事业也开始重归正轨。就在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时，1949年11月，蒋介石台湾当局派飞机连续轰炸中国大陆沿海城市，陈嘉庚亲手创办的集美学校在轰炸中遭到严重破坏。他对此固然痛心疾首，却毫不气馁，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向海外亲友筹集大笔资金，不仅使学校重修一新，而且多有扩建，扩大了规模。

作为爱国人士，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看到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陈嘉庚的报国热情高涨。他将自己在新加坡的产业变为现款，用于扩建厦门大学。晚年的陈嘉庚，积极参政议政，不辞辛劳地奔波于祖国各地，考察各地工厂企业建设情况，并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或建议。

陈嘉庚晚年，在集美学村东南方临海的一角修建陵园，并取名为整园。整园的围墙上雕刻着上千幅壁画，记录了古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名人、奇景。在众多雕刻中，有一幅名为《台湾省全图》的作品最具匠心；而全图的一册，则另有他亲自撰写的《台湾史略》。其文饱含着一位爱国华侨期盼两岸统一、矢志于祖国富强的拳拳之心，文辞真挚感人，念之催人泪下。

1990年3月，为了纪念陈嘉庚先生，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一颗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陈嘉庚星”。一如这颗小行星，陈嘉庚的精神也在天地之间闪烁着光芒。

